
湖南时务学堂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探索^{*1}

朱汉民 胡长海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湖南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堂，也是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在教育宗旨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结合起来。在教育方法上，时务学堂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结合起来。时务学堂兼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长的特点，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探索。

【关键词】：湖南时务学堂；中国书院；西方大学；高等教育转型

【中图分类号】：K2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7)06—0010—03

为了推动中国教育的近代化，20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中国传统书院的废除与西方高等教育体制的引进。由于当时十分特殊的国际环境和政治背景，1901年清廷下令废除书院，延续一千多年的书院被视为历史糟粕而抛弃，书院在千余年发展历程中所积淀的文化精华并未成为中国大学文化的组成部分，而新的教育体制却完全是靠引进、仿效西方而建立，当时政治界、知识界似乎并没有能够冷静下来，思考是否应该将中国传统书院与西方高等教育结合起来，建立起一种既有世界近代大学长处并合乎世界发展潮流、又具有中国文化传统和教育特色优势的教育体制。这种建立近代高等教育体制的方式，不仅使中国传统教育与中国近代教育之间出现明显的断裂，还导致新的中国近代教育出现许多问题。书院改制之后，许多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纷纷发表自己的批评意见。如胡适就曾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1] (P111)}青年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时，也认为中国近代学校存在问题，提出要结合中国书院和西方学校的长处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中国古代书院是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从唐中叶开始至晚清教育改制，书院作为一种主要的文化教学组织延续了一千多年之久。书院通过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创新和传播高深学问，产生了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书院精神，也形成了一套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教育体制、管理制度和教学方法。书院成为中国教育史上最具特色、最有地位的教育机构，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但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没有积极传承中国传统书院的精髓，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仍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历史任务。

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晚清时期的政治界、知识界其实有人在做这一方面的思考和探索。晚清湖南时务学堂的开始创办和教育实践，就是这一方面的积极探索。今天，正值湖南时务学堂创办120周年之际，重新考察他们关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思考和探索，是有着重要意义和价值的。

湖南时务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所著名的学堂，其重要历史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政治上，它几乎与维新运动相伴而生，并且成为维新派传播维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参与维新运动的政治重镇；其二，教育上，它是湖南第一家新式学堂，也

¹ 收稿日期：2017-09-12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通史(13ZD12)

作者简介：朱汉民(1954—)，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宋明理学，湖湘文化。

是中国较早的新式学堂之一，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了重要探索。由于时务学堂在政治上影响太大，以往对时务学堂的研究，特别重视它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影响，而对它为中国高等教育转型做出的重要探索却讨论不多。

湖南时务学堂其实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转型的一种重要尝试，其办学特点就如梁启超自己表示：“超之意欲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兼学西文者为内课，用学堂之法教之；专学中学不学西学者为外课，用书院之法行之。”^{[2] (P248)}梁启超在此举教法而讨论时务学堂“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其实时务学堂在教育上的探索，远不仅是课程方面。本文的重点，就是综合讨论时务学堂如何推动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主要是探讨其兼传统书院与近代大学之长的特点。

1897年1月，由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领衔，正式呈报湖南巡抚陈宝箴，在湖南长沙创办时务学堂，得到官府的同意。这一年8月发布的《湖南时务学堂缘起》，阐明了时务学堂设学校、养人才的原因。湖南巡抚陈宝箴又发布《时务学堂招考示》，宣布“本年议定暂租衡清试馆开办，延聘中西学教习，择期开学，先行招考六十名入堂肄业”^[3]。委派黄遵宪、熊希龄具体负责学堂筹备事宜，任命熊希龄为提调，主持一切行政事务。接着，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聘请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梁启超专门为学堂制定《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进一步确定时务学堂的教育宗旨与教学要求。后来因为时务学堂卷入维新政治运动，1899年2月改为求实书院，1902年求实书院更名为湖南省城大学堂，1903年湖南省城大学堂与改制后的岳麓书院合并组建湖南高等学堂，到了民国以后又转型为湖南大学。

时务学堂作为湖南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是湖南近代化教育改革的开端，标志着湖南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型。考察《湖南时务学堂缘起》《湖南时务学堂学约》《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等一系列文献，以及时务学堂创办以后的教学活动，可以看到本学堂确实体现了主办者“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注重中西并重”的教育理念，对推动中国式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做出了很好的探索。

我们现在从湖南时务学堂的教育宗旨、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三个方面，考察一下时务学堂是如何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贯彻中西并重的教育的。

首先，湖南时务学堂在教育宗旨上，将中国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与近代西方大学的知识教育结合起来，以培养出既有士大夫精神人格、又拥有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近代知识分子。

梁启超在专门为学堂制定的《湖南时务学堂学约》中，系统表达了他的教育宗旨。梁启超在《学约》中列出十条，他解释其中最后两条是“经世”与“传教”^{[4] (P109)}，认为这是学生学成以后的目标，其实也就是时务学堂的培养目标。时务学堂希望能够培养既能“经世”、又能“传教”的人才，其实就是一种具有传统士大夫精神气质的社会精英，这和中国传统书院的教育宗旨十分一致。张栻《岳麓书院记》一文中，就确定了岳麓书院应该坚持“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5] (P573)}的教育宗旨。当然，梁启超在《学约》中提出的“经世”“传教”的内涵与古代书院宗旨有所不同，他们将近代教育的理念融入到儒家传统的传道、经世之中。同时，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学约》列出的以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和摄生等八条为学堂每日功课，也体现了其兼学堂、书院二者之长的教育宗旨^{[4] (P107-109)}。传统书院教育的最大优势，就是对作为社会精英的士大夫人格的培养，《学约》中的立志、养心、治身、乐群、摄生等，均吸收了传统书院的人格教育理念。《学约》大量吸收儒家经典和从事书院教育的儒家士大夫的教育理念和实践，引用了包括孔子、孟子、范仲淹、二程、朱熹、陆九渊、王船山、曾国藩等儒家大家有关立志、养心、治身的种种教育思想。

另一方面，湖南时务学堂作为近代学堂，又强调学者对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知识和思想的学习。梁启超在《学约》中对读书、穷理、经世、传教的规定，强调对近代西方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通识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如对于如何培养“经世”“传教”之人才，《学约》要求学习中西学的不同知识，其中既包括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还包括“西人公理公法之书”“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章”^{[4] (P109)}，以及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知识。

其二，湖南时务学堂在教育内容、课程安排上，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内容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课程结合起来。

如何培养一种能够像中国传统士大夫那样既能“经世”、又能“传教”的推动中国近代化的社会精英？除了《时务学堂学约》之外，梁启超还制定了《时务学堂功课详细章程》，最后颁布的《湖南时务学堂开办大概章程》就是依据于梁启超的《学约》和《功课详细章程》。对于时务学堂的课程设置，时务学堂的几个重要文件，均有不同程度的规定。时务学堂的课程分为两种：溥通学与专门学。溥通学是所有学生皆当通习的通识教育，内容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如算、理、公法、格物诸学）、中外史志及初步的格算诸学。时务学堂的溥通学包括中学与西学两方面的功课，其中既有包括《四子书》《朱子小学》《左传》《国策》《通鉴》《五礼通考》在内的中学课程，还有包括各国语言文字与相关算学、格致、天文、舆地的西学课程。专门学则相当于现代大学的专业教育，时务学堂要求每人各学一门专业课程，专业课程包括有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凡初入学堂，六个月以前皆学溥通学，至六个月以后学专门之学。^{[6] (P206-211)}

其三，湖南时务学堂在教育方法上，将中国传统书院教学方法与西方大学教育教学方法结合起来。

传统书院教学方法包括人格修炼的方法和知识教育的方法。时务学堂首先继承了书院的人格修炼教学方法。《时务学堂学约》强调“养心”，就来自于理学家在书院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7] (P2806)}教学方法。梁启超要求每日当以一小时或两刻功夫为静坐时间，他认为通过静坐，“一敛其心，收视返听，万念不起，使清明在躬，志气如神”^{[4] (P107)}。又如《时务学堂学约》强调“治身”，亦来自理学家在书院的教学实践，梁启超要求“治身之功课，当每日于就寝时，用曾子三省之法，默思一日之言论行事，失检者几何，而自记之。始而觉其少，苦于不自知也；既而觉其多，不可自欺，亦不必自馁”^{[4] (P108)}。另外，梁启超的许多知识教育的方法，也吸收了传统书院的教学方法。南宋理学家主讲书院时开创了许多新的教学方法，包括“会讲”“日课”“问答法”和“开讲”等，梁启超在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时继续沿用这些教学方法，他在学堂采用的讲学制度，既有堂上讲授，也有同学会讲，还有札记册、问答法和讲学制度等教学方法，其实均与传统书院相同或相似。

时务学堂又采用了西方大学教育的所谓“学堂之法”，实际上就是指班级授课制。《时务学堂更定章程》^{[8] (P388)}规定：将所招收的学生分为两班，各选中文领班学生照料和指导、领班学生呈中文札记，同时也考虑了到时再设西文领班学生的问题，实际上就相当于班级授课制。这种制度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中没有，完全是近代西式学校传入后才出现的。时务学堂的教学实践中，在从事自然科学的教学时，还使用了观察和实验教学的方法，这一点完全符合自然科学的教学规律。时务学堂的西学教习在中国近代科学教育教学方面，还进行了各种有益的尝试和积极的探索。

教育学界有一个普遍的观念，即认为中国现代的高等教育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并没有很好地吸收中国悠久的高等教育传统。中国现代大学体制之所以是一种舶来品，这是由近代中国特定政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然而，制度移植的历史性原因并不具有必然性与合理性。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也反复强调，“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9] (P221)}如果我们回到中国近代教育的起点，我们会发现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早期学堂，不少思想家、教育家在艰难地尝试着将中国传统教育与引进的西方近代教育结合起来，努力建立中国特色的近代教育。应该说，他们的经验是值得当代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大学参考学习的。

确实，以书院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完全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而且，教育是一个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而民族精神是无法模仿的，正如梅贻琦所言：“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故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10] (P46)}所以，当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需要建立在深厚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基础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加以现代化转化，使现代中国大学呈现出鲜明的中国气派。

参考文献：

[1] 胡适. 胡适全集[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2] 湖南省教育史志编纂委员会. 湖南近现代名校史料 1[M].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2012.

[3] 时务学堂招考示[N]. 湘学报. 第 16 册, 光绪二十三年, 八月二十一日.

[4] 梁启超. 梁启超全集:第 1 卷[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

[5] 张枬. 张枬集[M]. 长沙:岳麓书社, 2010.

[6] 丁一平. 湖湘文化传统与湖南维新运动[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8.

[7]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北京:中华书局, 1986.

[8] 时务学堂更定章程[N]. 湘报. 47 号, 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影印版.

[9] 人民日报社理论编辑部. 人民日报理论著述年编 2014[M].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5.

[10] 梅贻琦. 大学一解. 转引自杨东平. 大学精神[M]. 上海:文汇出版社, 2003.